

结语



塑造美国的新认同？

“我竞选总统是因为我相信我们正在为这个国家的灵魂而战。我仍然相信这是真的。我相信灵魂是我们的呼吸、生命和本质。灵魂使我们成为‘我们’”。2022年9月1日，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著名历史建筑独立厅门前，因呼唤“治愈”美国而当选的美国总统乔·拜登再次强调着要重塑这个国家的所谓“灵魂”。¹

事实上，新世纪以来，美国所面对的多重矛盾呈现出持续累积加剧并周期性发作的态势。“9·11事件”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的刺激、特朗普的崛起与当政、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失败等等……美国国家困境严峻复杂，形成了拜登在2021年1月20日宣誓就职时所提及的相互牵连、彼此影响、交互恶化的所谓“级联危机”。必须看到，当前美国的国家危机是这个国家此前所经历过的危机同一时空下的叠加与共振，更是美国政治经济制度长期存在结构性矛盾与缺陷的必然结果。不同领域的矛盾与危机存在着至少三种状况：历史经历的再现、周期性问题的反复以及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其解决之道则可能是重新塑造出一个新的国家认同与国家信条。这也就是拜登所说的所谓“灵魂”。

在政治领域，党争极化已达到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程度。这种极化趋势呈现出两党精英层面和选民层面上势如水火的“部落化”对峙，也表现为

¹“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the Continued Battle for the Soul of the Nation,”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1,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9/01/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the-continued-battle-for-the-soul-of-the-nation/>.

身份政治以及以族裔身份为基础的文化战争。当然，虽然如此之撕裂，但由于国内经济利益的联系、选民分布的内嵌以及类似于奴隶制等革命性议题的缺乏，如今的党争极化几乎不具备通过所谓“新内战”等高烈度冲突方式化解的可能性。按照以往历史经验，美国更倾向于通过形成某种改良共识、推动某些改良运动等方式，实现对相关政治制度的调整乃至重构，从而暂时缓和政争。在经济领域，美国垄断资本驱动下的制度缺陷和结构性矛盾周期性频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脱实向虚仍未得到解决；2008年金融危机再次暴露出美国经济治理框架的诸多弊端；而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美国的通胀问题、供应链问题再次引发了严峻矛盾，甚至不时会出现新的周期性衰退的风险。面对经济矛盾的频发，政治的极化又决定了政府无法提供长效性回应，反而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在社会领域，人口结构特别是族裔构成持续巨变，对国家认同形成了空前挑战。在人口不断增长的同时，老龄化程度加剧，族裔结构更为碎片化。到2045年时，白人比例将跌至49.7%，拉美裔可达24.6%，美国进而彻底进入一种“无多数族裔人口结构”的新状态，直接撼动着以往以白人文化作为主线的国家认同与群体信念。此外，不同趋势的叠加结果为：年长人口中白人比例增加，年轻人口中拉美裔较多，族裔政治进而可能表现为代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身份政治的分歧则将直接延伸到医疗、福利、教育等涉及到有限资源分配的公共政策领域。

从另一个角度看，当前美国所面对的国家困境至少有三个根源。一是全球扩张并不断攫取资本的精英无法回应本土民众的诉求、全球的精英和本土的底层之间的矛盾；二是多族裔结构持续加深甚至冲淡多数之后对传统文化与认同的挑战以及传统白人与继续快速增长的少数族裔之间的矛盾；三是自由派、后现代理念、“多元文化主义”对传统文化理念、保守宗教理念的侵蚀，后现代西方价值观与传统宗教价值观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共同根源在于当前美国认同的瓦解、美国信念的消失。

具体而言，在国内层面，美国完全可以被视为始终是一个价值观认同联盟。目前，国内不同政党、不同群体对价值观的理解与认同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显著分歧与对峙，价值观认同的联盟分崩离析。在对外层面，

美国可以被视为是一个以价值观扩张为主导、追求领导地位的霸权国家，目前的国际地位损害了其自身的价值，美国也需要重塑国际地位，以维持国内价值与共同认同。

以认同或信念为根源，其矛盾的主线则是关于如何重塑价值观认同的争夺。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之内，美国政治制度上难以想象会有什么重大颠覆性变革；经济制度和结构性矛盾也无法改变，潜在的科技创新只能缓解但也无法彻底解决本质问题；社会层面上的人口结构、族裔构成的变化则显然难以逆转。面对这些可以说相对固定的多重矛盾，这些“灰犀牛”而非“黑天鹅”，解决当前美国国家困境的出路只能是构架新的认同、新的信念，以新的认同或信念应对固有问题。在这个主线上，两党争夺塑造新认同：谁能塑造出更新的、能够吸纳更多人支持的认同，谁就能获胜执政。

在这种重塑的争夺中，在如何定义一个新的美国、一个新的美国人认同的争斗中，两党已经展现出不同的道路选择。民主党在塑造一个面向未来的、多元文化主义的“明日认同”，更加倾向于精英；共和党则在重塑一个传统文化与宗教理念导向的“昔日认同”，看似是白人认同，但也可能会吸引到某些同样持有保守价值观的少数族裔群体。在不同的认同选择之下，民主党将逐渐成为一个白人知识精英和自由派少数族裔结合的精英群体，而共和党则可能变成了一个少数商业精英、中下层白人以及保守派少数族裔结合的大众群体。从面对国家危机时民众更倾向于民族主义、本土主义，更倾向于回归传统认同的判断出发，共和党及其选择的重塑认同的道路极可能更易获得更多美国民众的支持。

回顾其国家历程，美国的早期国家建构不但是解决国内认同的过程，也是同步处理对外事务（与欧洲主要国家关系）的过程。或者说，对美国而言，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是同步发生的、被同时考虑的。国内的矛盾也必然也需要通过调整对外政策来得到解决。而在如今美国国内矛盾叠加、重塑认同成为主线的情况下，其对外政策的某些趋势与倾向也必然会受到多方面影响。

除了更加内顾及国内政治化、对外承诺空间与能力被挤压、对外行为稳定延续性持续降低、对外政策与战略选择无法得到专业反思等影响

之外，以重塑国家认同为目标的美国对外政策也必然导致其非理性的竞争性乃至对抗性。美国极可能对外极度强调自身的所谓价值观优势，并在外部世界同步塑造出一个在认同或价值观意义上的彻底的对手。具体而言，找到一个足够量级的“靶子”或“对手国”，加以在价值观或宗教色彩的猛烈抨击，将其描摹为无法与美国价值观、认同或信念相提并论的“道德威胁”，挑起对方对美国的反击，从而达成一种自我实现、加速整合在外部威胁或危机刺激下的美国认同的重塑。这种做法可能非常类似于1981年上台的里根面对着1970年末美国所面对的多重矛盾而直接将矛头继续指向苏联、大搞价值观论战，成功“团结”美国国内不同利益的历史情节。如何避免在美国“内病外治”下“自我实现”，如何避免进入美国的“剧本”并成为我们根本不是、也不希望成为的美国的“对手”，无疑是对美互动中最值得深思的问题。

中美互动以来，我们从未经历过一个需要通过渲染中国所谓“威胁”来重塑自身认同、来解决自身问题的美国。这就决定了我们要持续对这个国家重新认识。这种重新认识，不仅因为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期间表现出了激烈的变化，也是因为这个国家事实上始终在变化之中。只是有一些非常显性甚至具有戏剧性、爆炸性，另外一些比较隐性但却可能积蓄着极大的能量。所以，我们应该持续对这个国家保持重新认识的紧迫与警惕。或者我们可以说，不是今天有一个特朗普，就要重新认识，而是重新认识一直在路上。

一是，打开美国、从美国内部重新认识美国。任何国家都不是“铁板一块”，美国也不例外，美国是明显反对美国自身的，这也是其更为突出的特征。因而，我们必须厘清美国的内部机制以及那些细微却关键的变化，尽可能捕捉到、认识到新发展，深思这些发展的根源与影响。二是，绕开美国、从美国之外重新认识美国。美国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国家，需要在世界舞台上、在第三方视角上重新认识。很多根源于国内的行为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或许更为淋漓尽致，更需要联系起来看清楚其国内的真实需要与意图。比如，北京大学的钱承旦教授近年曾提出，如今的美国仍在“西进”之中。按照这个判断，美国如今在亚太地区谋求的地位强化、或者说是所谓的“印太”战略，完全可以理解为是美国继续“西进”的重

要表现。事实上，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阿齐兹·拉纳（Aziz Rana）在其专著《美国自由主义的两面性》（*The Two Faces of American Freedom*）中也指出，美国一直秉持着“定居者主义”（settlerism），不但是在国家建构与发展历程，也是在对外战略与具体政策选择上。换言之，美国在不断通过征服至少是塑造其内部和外部的“他者”来体现、来验证、来维护其自认为具有的制度与价值观意义上的优越感。三是，从认识自己出发，重新认识美国。美国有变化、有发展，需要不断重新认知，我们自己也有变化、有发展，也需要不断更新认识。我们需要不断地发问，美国怎么了？这样的美国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怎样的美国和世界？关于这些问题与时俱进的思考与回答，应该有助于始终保持头脑清醒，继续保持在中美互动中的正确航向。